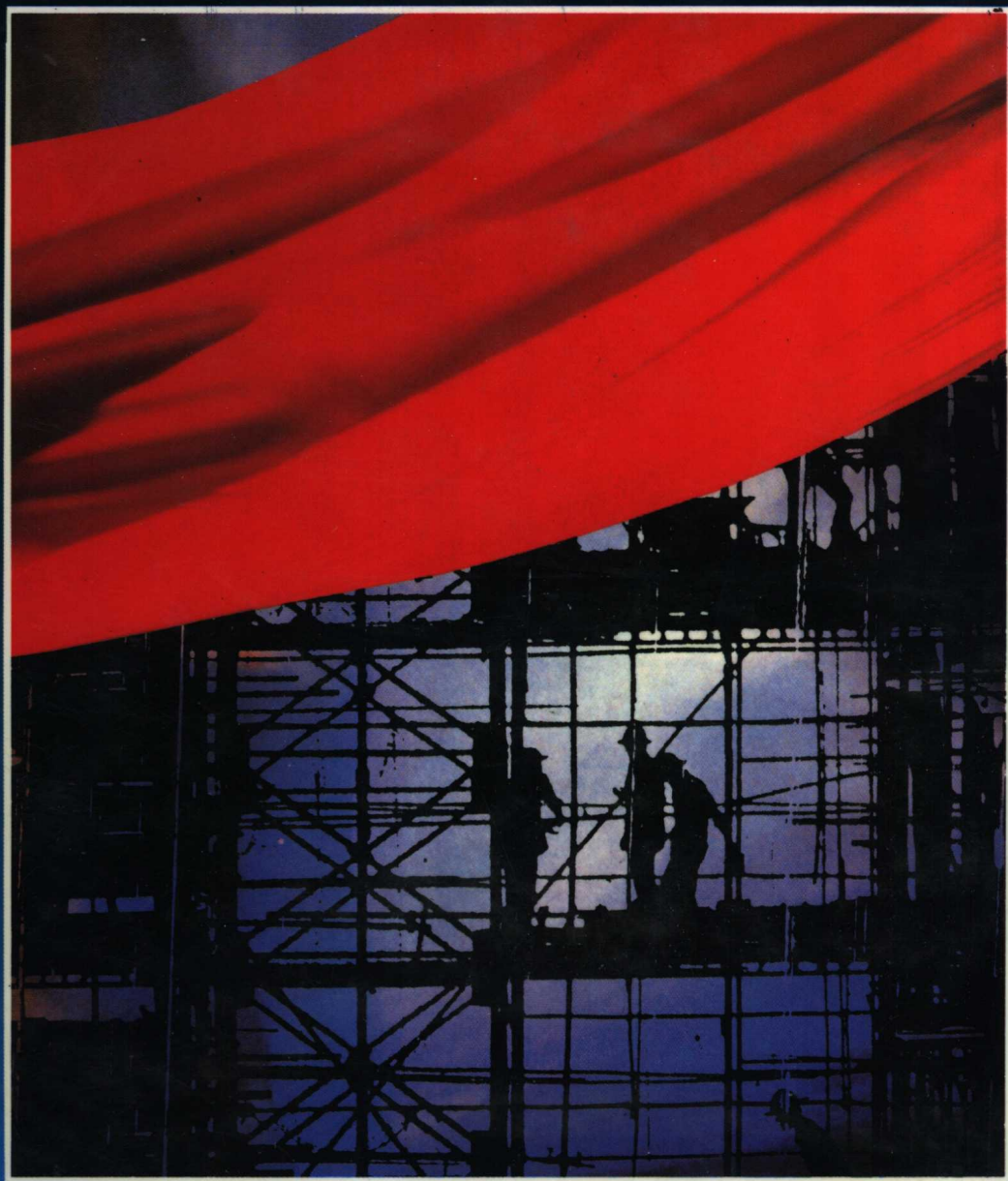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长编

卷三

1966—1976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

63-3-17

总 编 委 会

顾 问 戴 逸 金 冲 及 丁 伟 志
李 侃 郑 惠 徐 宗 勉

主 编 刘国新 刘 晓 贺耀敏

副主编 武 力 杨 辰 戴 国 庆 刘 占 昌

编 委 钟真真 王 伟 王 树 何 虎 生
林 嘉 王 树 李 松 林
陈 思 训 王 树 吕 微
彭 卫 王 树 包 仁
孔 繁 顺 刘 占 义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夏永翔 区向明
责任校对 张 平 周成翼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

第三卷

主编 刘国新 刘 晓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

字数 95.4 千字

版次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219—02787—7/K · 330

本册定价 60 元

(全套定价 268 元)



第三卷

(1966 — 1976)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三卷 编委会

主 编	刘 国新	刘 晓				
副主编	武 力	李松林	夏 潮	林 嘉	韩 孟	
编 委	陈东林	安建设	杨凤城	李丹慧		
作 者	钟真真	黄 伟	何虎生	赵永承	刘 晓	
	刘国新	陈东林	安建设	李丹慧	王 进	
	韩 孟	武 力	李松林	曾卓明	胡 荣	
	张 丁	钟真真	贺宏善	张碧霞	母 耀	
	黄 伟	向 彪	杨凤城	夏 潮	江 秀	
	王 虹	何虎生	毛仲伟	王爱华	刘 占	
	倪晓华	沈 谦	曹希岭	史君红	杨 亲	
	赵 旭	林 嘉	李 英	杨 红	王 宏	
	肖艳丽	曹 纯	赵永承	许士荣	王 戴	
	柴观珍	刘惠君	史晓辉	侯京辉	晨 京	
	赵燕华	张 爽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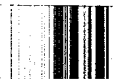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都没有离开过这个题目,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逐渐积淀下一些想法,想法多了,又逐渐升华为一个愿望,这就是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的初衷。

共和国史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个魅力就在于当代社会的有机性和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造就了当代中国历史舞台跌宕起伏的剧情,历史事件的峰回路转,历史人物角色命运的大起大落,常令一些普适的方法和原理遇到挑战,这都不是维像的图描和直观的线性因果分析所能完全解答的。当代社会的高科技、信息化和系统性使各门学科和各种知识日趋整体化,只注意一点,会失之片面,只熟知某一方面,也会流于偏颇。研究者要想迸发创造的火花,就必须脱离偏重政治史的巢臼,学会观察和评判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要有思维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以及较强的思辨性。共和国史的魅力还在于它有更直接的借鉴作用和警世功能。相对于其他断代史,共和国史同现实

社会的联系更紧密。当我们需要从事实向理论过渡,总结历史经验时,就会发现所直面的事实,往往还是清晰的,尚未蒙上岁月的风尘,揭示其真谛,减免了许多曲折。尤其重要的是,这段历史时限内曾经发生的事与正在进行的事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阶段性可能结束了,过程则仍在继续。在这里,“前事不忘”是人们脑海中鲜明的印象,它没有做作和掩饰,没有人为的编造和雕琢,因而,才能成为指导人们实践的“后事之师”。

共和国的魅力当不止这些。如果说既往历史像风平浪静的港湾,那么共和国史就好比波澜壮阔的海洋,它的深邃和广博吸引你去扬帆踏浪。这正是以共和国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近年呈洋洋大观之势的重要原因。

如何既再现共和国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又不与已经出版的各种史著雷同?这个问题曾长时间萦绕在心头。苦思之后,还是从前人的遗产如《史记》,如《资治通鉴》等中获得一点感悟,从而设计出现在这样一种编写体例:各卷统一分为



总论、重大事件、人物、大事记及文献资料五部分。

“总论”为各卷之首，从宏观上勾画本时期历史概貌及其发展阶段，侧重于纵向叙述，其中也包括对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的概括及总结。以期使读者获得一个总体的框架式的印象。

“重大事件”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和史学的叙事功能，侧重于历史的横断面。每一事件独立成篇，力求完整地揭示其发生、发展及结局。这些事件都是历史的关节点，它们一个一个相连，就构成共和国史的脉络。在编排上，大体依时间先后为序。

“人物”是吸收传统史学纪传体的长处，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和建设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突出作用的人物和英雄模范立传，这是通过人的活动从另一侧面再现历史和透视人物的历史作用的一种尝试。

“大事记”是学习传统史学编年史体例，以年、月、日为经，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科技、卫生、民族、国土、人口等林林总总的事为纬，编织出一幅细密的网络。

“文献资料”包括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沿革及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总目和文献资料要目。

总之，主旨是使本书既有宏观的概括（如“总论”）、又有中观的叙事（如“重大事件”），还有微观的记录（如“大事记”）；既有原始资料供参考，又有研究成果备索引，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展现共和国历史风貌。当然，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是否实现了作者的意图尚望读者裁定。如果读者觉得还有点意思的话，那也是各位作者努力的结果。顺便指出，本书的

4卷依次为：1949——1956年为第一卷；1956——1966年为第二卷；1966——1976年为第三卷；1976——1994年为第四卷。这种划分是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各种版本的共和国史著都因袭此制，本书亦不例外。

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我们感到没有同行学者的丰富积累和当代资料出版事业的发达，完成此书是不可想象的。本书引用了国内外不少研究成果，其中能确切指明资料或观点出处的，均尽可能在脚注中说明，以便利读者进一步研究。我代表作者对本书所引用到的有名或无名作者深表谢忱。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这一学科中的很多专家和老一辈学者曾给予热情的关注和极大的帮助，部分手稿承蒙有关专家审阅，戴逸、金冲及、丁伟志、李侃、郑惠、徐宗勉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在此，全体作者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当此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图书出版受到严峻挑战之际，广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能够不为功利所趋使，斥重资出版此书，这种扶持学术的魄力和着眼于长远文化建设的良苦用心，令人崇敬。夏永翔、区向明、欧薇薇、温六零等同志更为本书付出辛勤的劳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恐怕此书只好暂时搁浅了。

刘国新

1993年4月于北京小石桥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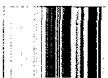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目 录

前言	(1)	“文革”初期的周恩来	(38)
总论	(1)	一、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	(38)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	二、在“大闹怀仁堂”前后	(40)
一、“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1)	三、保住每一位老战友	(44)
二、“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9)	控制混乱局势的努力	(47)
三、“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危害 及主要教训	(15)	一、地方建立革命委员会	(47)
重大事件		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上层 建筑领域	(49)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与导火索	(19)	“斗、批、改”运动	(50)
一、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	一、“斗、批、改”运动的提出	(50)
二、“二月提纲”与“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纪要”	(20)	二、“斗、批、改”运动的指导思想 和“六厂二校”经验	(51)
三、“三家村”与“彭罗陆杨反党集 团”冤案	(23)	三、“斗、批、改”的内容	(52)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再发动	(25)	周恩来与“抓革命，促生产”	(57)
一、从“5·16通知”到北京大学第 一张大字报	(25)	一、“革命”与生产的冲突	(57)
二、工作组之争	(27)	二、较量与挫折	(59)
三、“炮打司令部”	(29)	三、抓生产的不懈努力	(61)
四、红卫兵运动	(30)	纠正“文革”初期外交工作的偏差	(64)
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1)	一、极左路线对外交工作的冲击	(64)
从“一月夺权”到全面内战	(33)	二、纠正偏差，修复对外关系	(66)
一、上海“一月夺权”	(33)	中苏边界谈判	(68)
二、二月抗争	(34)	一、中苏边界存在的问题	(68)
三、“全面内战”	(36)	二、珍宝岛事件	(69)
四、“杨余傅事件”	(37)	三、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71)
		四、中苏举行国家关系谈判	(73)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上)	(73)

一、运动初期的困惑	(73)	四、批林批孔运动的严重后果	(120)
二、派工作组始末	(74)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21)
三、主动承担责任	(76)	一、四届人大工作概况	(121)
四、“倒刘狂潮”	(77)	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123)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下)	(78)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全面整顿	(125)
一、“刘少奇专案组”的成立	(78)	一、江青集团组阁阴谋失败	(125)
二、八个“为什么”	(80)	二、全面整顿,各条战线出现转机	(128)
三、“我已失去自由”	(81)	“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131)
四、“永远开除出党”	(83)	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31)
五、最后的日子	(84)	二、周恩来逝世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132)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85)	三、“四五运动”的爆发及被镇压	(133)
一、登龙有术	(85)	四、“四人帮”的覆灭	(136)
二、逆我者亡	(88)	中央精减与地方扩权	(137)
三、拉帮结派	(90)	一、精减机构	(137)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92)	二、中央企业下放,扩大地方管理企业权限	(138)
一、庐山发难	(92)	三、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	(138)
二、政变未遂	(94)	四、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建投资“大包干”	(139)
三、折戟沉沙	(96)	五、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	(141)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98)	工业的整顿与发展	(143)
一、动乱初期纠“左”的努力	(98)	一、第一次工业整顿及挫折	(144)
二、不失时机推动斗争深入开展	(100)	二、第二次工业整顿及挫折	(145)
三、斗争最后遭到挫折	(103)	三、地方五小工业	(146)
中美关系缓和与开拓外交新局面	(104)	“农业学大寨”	(147)
一、中美关系缓和	(104)	一、大寨的“文革”中的演变	(148)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07)	二、从大寨大队到大寨县	(149)
三、中日建交	(108)	三、“农业学大寨”中的问题和教训	(152)
四、同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109)	三线建设	(154)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10)	一、国际政治环境与建设三线决策	(155)
一、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	(110)	二、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	(156)
二、“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形成的过程与背景	(112)	三、三线建设的基本方针与组织领导	(157)
三、“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主旨与意义	(114)	四、三线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159)
批林批孔运动	(115)		
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起	(115)		
二、批林批孔批周公	(116)		
三、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抵制	(120)		

对外经济交往·····	(160)	五、党外势力的崛起·····	(195)
一、技术引进与“蜗牛事件”·····	(160)	六、蒋介石病逝·····	(196)
二、对外经济援助·····	(161)	台湾经济的“起飞”与调整·····	(197)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短期波动·····	(163)	一、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	(197)
一、“首起首落”·····	(164)	二、出口加工区的建立·····	(198)
二、“二起二落”·····	(166)	三、“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与台湾 经济的快速增长·····	(199)
三、“三起三落”·····	(168)	四、石油危机对台湾经济的冲击 及稳定经济的措施·····	(200)
四、“三起三落”后的恢复与失误 ·····	(168)	五、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十项建设 ·····	(201)
“文革”时期国家教育事业的破坏及 纠“左”斗争·····	(169)	六、由兴到衰的农业·····	(203)
一、“文革”之初对原有教育体制 的否定与批判·····	(169)	教育革新与科技发展·····	(205)
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	(171)	一、《发展国民教育长期计划》·····	(205)
三、教育制度的改革·····	(172)	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 ·····	(206)
四、教育系统的初步整顿和批判 “教育回潮”·····	(174)	三、倾力兴办职业教育·····	(207)
五、1975年的整顿和“教育革命 大辩论”·····	(175)	四、教育发展的杠杆·····	(209)
“文革”时期军队建设的曲折历程·····	(177)	五、科技体制的确立·····	(209)
一、林彪、江青阴谋搞乱军队·····	(177)	六、发展科技的主要措施·····	(210)
二、军事工作的削弱和损失·····	(179)	七、科技研究与应用·····	(211)
三、维护军队稳定的斗争·····	(180)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212)
四、排除极“左”错误干扰的整顿及 其受挫·····	(181)	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212)
五、战备工作的成绩·····	(183)	二、“现代诗论战”·····	(213)
文艺战线的浩劫与斗争·····	(184)	三、“文学批评方法之争”·····	(215)
一、“文革”前夕的“左”倾文艺思潮 ·····	(185)	“外交”大溃决与“实质外交”·····	(216)
二、对文艺界的浩劫·····	(185)	一、在联合国跌跤·····	(216)
三、“四人帮”的文化专制·····	(186)	二、尼克松冲击·····	(217)
四、党和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 文化专制的斗争·····	(188)	三、台、日“断交”·····	(218)
重大事件（台湾）		四、“实质外交”·····	(219)
蒋介石完成传子部署与“革新保台” ·····	(191)	五、保钓运动·····	(220)
一、一届四次“国大”的争吵·····	(191)	人物	
二、中国国民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的召开·····	(192)	马明方·····	(221)
三、一届五次“国民大会”与“中央 民意”代表“增补选案”·····	(193)	马叙伦·····	(221)
四、蒋经国组阁与推展行政革新 ·····	(194)	王树声·····	(222)
		王维舟·····	222
		王稼祥·····	(222)
		毛泽东·····	(223)
		方 方·····	(224)
		邓 拓·····	(225)
		邓子恢·····	(225)
		邓宝珊·····	(226)
		艾思奇·····	(226)



卢 汉	(227)	周恩来	(248)
叶 群	(227)	郑君里	(249)
田 汉	(227)	赵树理	(249)
田家英	(228)	南汉宸	(249)
白崇禧	(228)	饶漱石	(250)
冯雪峰	(229)	施复亮	(250)
老 舍	(229)	贺 龙	(251)
朱 德	(230)	徐特立	(252)
华 岗	(231)	徐海东	(252)
刘少奇	(231)	翁文灏	(253)
刘文辉	(232)	高树勋	(253)
许广平	(233)	高崇民	(253)
许光达	(233)	唐生智	(254)
孙 科	(234)	陶 勇	(255)
李 达	(234)	陶 铸	(255)
李立三	(235)	黄绍竑	(255)
李四光	(235)	黄琪翔	(256)
李宗仁	(236)	曹荻秋	(256)
李烛尘	(236)	章士钊	(257)
李富春	(237)	章伯钧	(257)
李德全	(237)	康 生	(258)
杨明轩	(238)	阎红彦	(258)
吴 晗	(238)	梁思成	(258)
吴玉章	(239)	彭德怀	(258)
何香凝	(239)	董必武	(259)
宋子文	(240)	蒋介石	(260)
张云逸	(240)	蒋光鼐	(261)
张志新	(241)	程 潜	(261)
张君勱	(241)	傅 雷	(262)
张治中	(242)	傅作义	(262)
张闻天	(242)	傅连璋	(263)
张霖之	(243)	曾 山	(263)
陈 毅	(243)	曾泽生	(263)
陈叔通	(244)	曾昭抡	(264)
陈其尤	(244)	谢觉哉	(264)
陈昌浩	(245)	谢雪红	(265)
邵力子	(245)	谢富治	(265)
邵荃麟	(246)	溥 仪	(266)
林 彪	(246)	蔡廷锴	(266)
范文澜	(246)	廖鲁言	(267)
罗家伦	(247)	熊克武	(267)
周小舟	(247)	滕代远	(268)
周荣鑫	(248)	翦伯赞	(268)

大事记

1966 年	(269)
1967 年	(297)
1968 年	(321)
1969 年	(337)
1970 年	(359)
1971 年	(375)
1972 年	(385)
1973 年	(396)
1974 年	(410)
1975 年	(422)
1976 年	(434)

大事记 (台湾)

1966 年	(445)
1967 年	(445)
1968 年	(447)
1969 年	(448)
1970 年	(450)
1971 年	(451)
1972 年	(453)
1973 年	(455)
1974 年	(456)
1975 年	(458)
1976 年	(460)

文献资料**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组织沿革和领导成员名录**

(一) 中央	(463)
中国共产党	(463)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46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4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47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479)
中国人民解放军	(480)
各民主党派	(482)
人民团体	(483)
二、各省、市、自治区	(484)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	(484)

北京市	(486)
天津市	(487)
河北省	(488)
山西省	(489)
内蒙古自治区	(490)
辽宁省	(491)
吉林省	(492)
黑龙江省	(493)
上海市	(493)
江苏省	(494)
浙江省	(495)
安徽省	(496)
福建省	(497)
江西省	(498)
山东省	(498)
河南省	(499)
湖北省	(500)
湖南省	(501)
广东省	(5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504)
四川省	(504)
贵州省	(505)
云南省	(506)
西藏自治区	(507)
陕西省	(508)
甘肃省	(509)
青海省	(509)
宁夏回族自治区	(5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11)

二、研究成果目录

(一) 论文	(512)
(二) 著作、工具书	(516)

三、主要文献资料索引

(一) 政治	(523)
(二) 经济	(526)
(三) 教科文卫	(527)
(四) 军事	(528)
(五) 外交	(529)

总 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即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十年中,国家建设事业遭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文化革命,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其发生有着深刻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

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集中反映在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些文件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等等。这些错误论点都源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这是自 1957 年以来提出并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是“文革”前十年错误理论积累的结果。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重提阶级斗争是

主要矛盾,并提出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错误观点,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斗争,把社会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引向党内,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到1966年春,全国约占1/3的县、社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少数城市约占3.6%的国营工业交通系统开展了“五反”运动。由于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认为农村基层单位有1/3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中,“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已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错误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4年10月以后,许多基层单位进行了“夺权”斗争。12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与此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中央各部门、各地方以至中央领导核心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批评中共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1965年10月,他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他甚至担心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并为此采取了防范部署。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错误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认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

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又为什么把“中央出修正主义”作为现实危险提到全党全国面前呢?这是由于:

第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空想成份,有相当一部分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毛泽东自信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既有马列主义的某些论点作为理论基础,又有他自身在民主革命中的亲身经验作为历史依据,还有渴望人人都能平等生活的亿万农民为群众基础。加之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直站在正确方面,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宿愿,又在短短几年内大踏步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壮举。巨大的胜利滋长起骄傲情绪,认为他所坚持的都是马列主义的,而与他不同的意见,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超越现实生产力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总要引起党内和社会上的反对或不同程度的抵制,对此,毛泽东总是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释问题和处理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体制上的弊端也进一步暴露出来。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虽然也提出了一些符合客观规律的重要原则,如工农业同时并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等,但也提出了一些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脱离中国实际的主张,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重视不够,企图单凭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就能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而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用“一大二公”概括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大二公”又导致“共产风”。虽然毛泽东最早纠正“共产风”,但他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强调变革,不强调稳定,强调提高公有化程度。直到他的晚年,还运用列宁的话来论证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他多次对包产到户的批判,证明毛泽东是

把任何条件下的个体经营都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纯粹又纯粹”的社会主义。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依然留恋战争年代的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在他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的鼓励”,“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很大意义”。这里,毛泽东既忽视了在战争年代,人们的革命精神中已经包含着追求人民的根本的物质利益而不是脱离了物质利益,又忽视了在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应有不同的方针和方法。1958年,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直至他的晚年仍然坚持这一主张。他认为一些人工资高了,就会脱离群众,逐渐蜕化变质。1974年12月,他在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姚文元之流把他的的话加以引申,便得出了体现在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一个温床”。毛泽东认为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可以脱离个人物质利益的动因。他在1960年读苏联第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多次批判物质利益原则。他说:“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是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这样地宣传物质利益,资本主义成了不可战胜的了”。他把关心群众物质利益与政治思想工作完全对立起来,而又把它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他认为关心个人物质利益,“只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似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都应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只知贡献,不问报酬。因而,对于该书中“社会主义的生产的目的——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熟练劳动力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了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区别逐渐消失”,这样正确的观点也要进行批判。然而,他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传统观点又坚信不疑,如认为个体经营(不管是在什

么条件下)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自由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的土壤;价值规律不能作为计划工作的依据,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些观点,使他把六十年代初中央第一线所采取的若干经济调整 and 改革措施,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从而对中央第一线的领导越来越不满。总之,毛泽东所理解 and 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蓝图;一是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人人都为公共利益而劳动,不计较劳动报酬;三是人人过着大致相等的生活,差别很小;四是各地区在经济上能自成体系,自给自足。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同当时中国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

毛泽东为实现他所想像的社会主义,还提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他根据自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认为用政治挂帅,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既然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打碎旧世界,就一定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建设一个新世界。他认为,只要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有一个大跃进的速度。他重视政治的动员作用,却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他重视普通工农的作用,却轻视科学技术专家。他这时的政治挂帅,常常是用错误的或过火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实现的。

第二,错误地将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到国内党内,并将反修防修作为头等大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发生论战,中国在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斗争的同时,对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也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当时党中央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正在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正在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严重的历史教训。基于这样的认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就把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斗争,作为全党的重大课题。1963年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质就是以反修防修为纲。人们错误地认为,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江山已经改变了颜色,苏联人民几十年奋斗的成果已经丧失,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把反修防修作为头等大事吗?反修防修的口号,毫无阻碍地得到全党的

赞同。由此可见,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对国内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没有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就不可能提出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的任务,“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之所以能得到一些人的拥护,即使有怀疑和抵触情绪的人,也表示要努力紧跟,加深理解,就是因为它是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开展的。毛泽东之所以要始终不渝地维护“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他认为发动这场“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着重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其中一个突出的论点,是夸大社会主义国家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夸大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夸大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而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文章在列举了苏联的工厂、农村和国家机关中某些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倒把活动之后,武断地认定:“在苏联,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既然苏联资本主义正在复辟,那么毛泽东号召“反修防修”,在人们看来,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了。

第三,1961年以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和毛泽东的意见分歧,被错误地当作修正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斗争。如果仅仅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还不会导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有两个独立王国,即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局的多数,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处,是两个独立王国。他认为,要解决这两个独立王国,用通常的方法,即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本人是少数,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在以往的一个长时期内,党中央很少有重大的意见分歧。工作中的不同见解,通过认真讨论很容易求得统一。因此党中央是紧密团结的,在发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

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党中央在认识上都是一致的。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党内的分歧开始于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切实纠正“左”的错误。一场“反右倾”斗争却使彭德怀等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打击。1961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的许多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使更多的领导人对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利弊得失,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然而中央第一线的一些领导人的见解,却不为毛泽东所接受,相反,认为他们是对三面红旗产生了动摇,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的表现。

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主要在两上问题上:一是对困难时期形势的估计,二是为克服困难应采取何种措施。

毛泽东认为必须充分肯定“大跃进”运动的成绩,对困难估计得严重了会使人民群众丧失信心。他多次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他认为缺点讲多了就会给干部和群众泼冷水。他指责那些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困难的同志是刮“黑暗风”。1961年以后,由于深入第一线掌握了真实情况,对于“大跃进”运动的认识,刘少奇等同毛泽东的分歧就逐渐明朗化了。刘少奇在他家乡宁乡县炭子冲回答当地干部和农民的问题时,明确指出,近几年生产和生活下降的原因,主要的不是天灾,“主要是这里的工作犯了错误,”而这种错误,又主要不能怪基层,“上边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有一部分责任”,“根子还在中央。”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造成困难的原因,作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正确判断。指出,“在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显然纠正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

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他要求全党对于承认缺点和错误,不要“枝枝节节、吞吞吐吐”,而要“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篋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不然的话,“经验就无从总结”。^①当陈云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有巨大赤字,全党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严重困难估计不足,而要求作大的调整时,刘少奇大力支持陈云的意见。在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要求全党要充分估计困难。他指出:“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时,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上述分析是右倾的估计,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时承认,他从1962年开始,就想从政治上把刘少奇搞掉。

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措施。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刮了两股右倾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带有资本主义复辟的性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通过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为克服困难,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他提议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采纳了陈云提出的许多果断措施。在分配问题上,刘少奇强调按劳付酬。他说:“不要随便说计件工资是落后的。”在流通领域,他强调等价交换,指出“国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调拨,也要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不懂政治经济学是要垮台的”。在政府管理企业的方式上,他强调用经济办法,反对单纯用行政办法,他说:“我们现在的办法是省市的厅局、中央各部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企业要搞经济

核算。组织企业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按经济办法管理,按等价交换、经济法则来办事”。刘少奇实际上提出了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毛泽东却认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认为,只有把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推广到工业部门,才能保证建设任务的完成。他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几年了”,不这样做,就“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他认为,把物质利益原则提到首位,就会产生资本主义。

分歧还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当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下达后,周扬在1964年1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实际上不同意对文艺战线成绩基本否定,刘少奇当即表示:“我看周扬同志讲的情况和意见都很好”,并针对“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的指责,指出:“剧目,凡是无害的都容许演”。“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京戏,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对于这种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实际上是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而毛泽东却背离了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正确方针。在知识分子问题上,1962年3月,周恩来在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再次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肯定“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但是,毛泽东对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并不赞同。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仍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称呼,指责他们“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

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最不满的,还是所谓“单干”和“翻案风”。1961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刘少奇、陈云等对这种能提高农业生产的制度表示支持。邓子恢曾为此给中央写报告,建议中央采纳这种制度,认为它并未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但毛泽东却把包产到户视为分田单干,表示坚决反对。在北戴河会议上,他错误地指责中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2页。